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 ——中国聚落考古“三山一水”初步比较

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在公认“中华文明多源论”的前提下,“三山”(华山、龙山与红山)被不同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作为仰韶文化(华山)中的佼佼者,距今6 000~5 000年前的西安杨官寨遗址虽然目前还未全部发掘完毕,但从各方面看,包括其地出土陶祖,足以确证其即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而与其同时的红山辽西牛河梁遗址体现的则是落后于西安杨官寨遗址的女权文化,郭大顺教授的“主要实证”及“一人独尊”说等均难成立。至于龙山文化虽然出场时浓妆惊艳,但是毕竟珊珊来迟,不足以构成对西安杨官寨遗址作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挑战。综合比较“三山”,显然西安杨官寨遗址堪作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

关键词:西安;杨官寨遗址;牛河梁遗址;龙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2)04-0021-06

2012年7月12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公布了10年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已建立起各地区公元前3 500年后中华文明源头的考古文化年代序列,其中名列首位的中华文明源头是辽西牛河梁遗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未受到足够重视^[1]。本文为表异议而撰。

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苏秉琦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曾风趣地用“泰山”代指山东苏北龙山文化,用“华山”代指关中、豫西和晋南一带的仰韶文化,说山西陶寺文化是此二“山”加“北方”3个“根”的结合体,此“北方”是指包括牛河梁遗址在内的燕山之北红山文化^[2]。本文副标题中“三山”即借用苏老此语,确指中国公元前3 500年前后的聚落考古文化研究中大体同时的这3个北方地区。“一水”是指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文化,如良渚文化等。它的发展水平很高,但鉴于其在时间上显然远后于“三山”^[1],故本文存而不论。而“三山”均被不同考古学家在公认“中华文明多源

论”的前提下,分别视为中华文明首源,其中,苏老和他的学生郭大顺教授是“红山派”代表者^[2-3];李学勤教授和王震中研究员是广义的“龙山派”(包括河南)代表者^[4];当年发现豫西仰韶村遗址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已作古的一些老一辈考古学家,则是“华山派”^[2]。目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陕西考古学家石兴邦研究员和张天恩研究员也是“华山派”代表者^[5-7],并力主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在西安,可视为“华山派”中的“西安派”,“华山派”中的“河南派”如今也颇具影响。

上述分歧源于学者对文明产生判定的标准不同,任何文明的产生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表现为从量变积累到质变突现。对此,苏老曾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序列理论^[2],并认为最早具备“古国”特征者才是中华文明源头^[2],被学界许多人认可。李伯谦教授还把此理论与文明起源研究中从英国丹尼尔“四要素”理论向最新的“聚落考古”推进的趋势相结

收稿日期:2012-11-05

作者简介:胡义成(1945-),男,陕西凤翔人,研究员。

合,使中华文明起源理论进一步科学化^[8]。本文特别注重其中“聚落考古”、聚落周边自然生产力研究成果及其文化推论。

一、华山: 杨址是 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

本命题的建立,一据杨址周边聚落结构形态的研究成果及其文化推论,二据杨址周边自然条件和当时由它决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研究成果及其文化推论,三据杨址文明要素发育状况。

(一) 仰韶文化后期杨址周边聚落结构形态突变

张天恩研究员撰有《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状况观察》一文,以仰韶文化中后期(即庙底沟时期和半坡晚期)杨址周边聚落群结构和形态迅速发展乃至巨变的资料,包括庙底沟文化时期它有“快速发展”,已发现了杨址以及彬县水北遗址 200 多平方米类似“四坡重檐式原始殿堂”的“大房子”等;在半坡晚期,又发现了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关中凤翔县水沟遗址等,其中后者分布范围当时“极为罕见”,竟达 100 万平方米以上,还发现了三合土铺地建筑,表示已“出现了高规格建筑相对集中分布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点类似于龙山时代及其后的大城套小城格局”,表明当地“社会分化的帷幕已经拉开”,出现了“文明的初阶”^[7]。从张天恩文可知,杨址周边在庙底沟时期已形成了处于当时发展高端的古聚落群,在其下还有大量中小古聚落群,涌现出杨址这样的超级“中心聚落”顺理成章。

由于杨址未完成发掘,故张天恩文只提“首次发现了庙底沟类型的大型环壕聚落”,是关中“中心聚落”,并未细展其他。后来,张天恩研究员进而定性杨址是“早期的都邑”^[9],认识更深了。其实,仅从杨址周边水沟聚落 100 万平方米遗址以及其中三合土建筑群看,半坡晚期的杨址确已堪当“文明初阶”实物证据。更何况,从其聚落内部结构看,杨址不仅有“在全国实属罕见”的长达 1 945 米的完整环壕,环壕挖出了 11 万立方米的土,表明当时已有“在全国实属罕见”的类似工程指挥中心的权力机构;其东北段还有疑似“墙基”的遗存,显示它可能是当时“在全国实属罕见”的城址;北部“陶祖”表明其地早在庙底沟时期,就由女权社会向男权社会过渡^[10];出土的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和涂朱砂人面残陶片,经推断是远古祭器,与《史记》关于黄帝在

此“郊雍上帝”的记载密切扣合,以明显直接的“二重证据”揭示出杨址作为“黄帝故都”曾有的大型礼仪活动^[11];其南半坡晚期的陶窑和窑窖等组成的制陶作坊,更从经济层面表明了当时社会分工出现,“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业”,陶窑则“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12];大量窑洞的出土也表明,杨址部落较易解决民众居住难题,大大有利于生产力提升^[13];分布范围达 80 余万平方米的杨址横跨庙底沟时期和半坡晚期,暗示当时当地基于黄土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实不低,足以维持较多人口长期定居等等。作为“黄帝故都”的杨址也是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应无疑义。这与黄帝是“人文初祖”的大量文献记载和传说也完全吻合。

李伯谦教授曾指,考古界有学者认为,仰韶晚期一些地区文明已经形成,也有人否定此说,症结在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不一^[8]。从杨址周边聚落发育状况和杨址内部文化结构看,仰韶晚期的它确已进入“文明初阶”,虽然它具有很强的原始性,但是人们总不能在初生婴儿长出胡子后,才承认其出生权。

(二) 杨址周边当时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如果说张天恩研究员侧重从周边聚落形态巨变和内部文化结构角度分析问题,那么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则侧重从杨址周边自然条件和当时更多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考察关中作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问题。在笔者看,这个角度从另一层面深刻切入了问题的本质。以国家雏型出现表征的文明起源,毕竟只是生产力发展在上层建筑中的一种表现而已,其“主根”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不可能产生在一个自然生产力水平很差的地域。“纯考古学家”有时可以忽略这一点,但文明起源研究者就不能在这里“犯糊涂”。

何炳棣先生是从关中黄土地带具有“自我加肥”性能及其决定的关中“自始出现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开始其思考的^[5]。在他看来,非“自我加肥”之地,当时是不可能出现村落定居耕作制度的。“惟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何以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竟能如此密集;何以仰韶聚落的设计,不但有其氏族集会的中心大房子和其周围为居住而建的小房屋群,而且还有窖穴、陶窑和整齐的氏族墓地。理应顺便一提的是:只有在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有可能产生人类

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5]。这一段话中所说附图(省略),即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研究员提供^{[5][3]},从中可知,杨址周围自我加肥的黄土地带和由它决定的地域生产力发展较高水平,形成其地古聚落特别密集;其地聚落密集程度甲于中国,构成了杨址作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的聚落发展基础和首要秘密。中国当时各地均不具备这种条件,故均难出现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

如何炳棣先生所指,“纯考古学家”往往忽略文明起源研究中的自然生产力问题。关于牛河梁遗址是文明首源象征地之断便是如此,见本文后述。

(三) 杨址文明要素的出现和积累

英国丹尼尔的文明起源三要素(5 000 居民以上的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中心)理论,未必能够全盘套用于中国。夏鼐先生除强调“国家”出现外,还加入了冶金技术和商业、宫殿遗址等^[4]。杨址虽尚未发掘完毕,但如前所述,从其文明要素产生积累的情况看,它作为中华“文明初阶”当之无愧。一是有当时“在全国实属罕见”的权力机构,即“国家”雏型;二是有私有财产;三是有城址迹象,从其环境围起的面积达24万平方米^[12]看,居民达5 000以上不成问题;四是有多种祭器,足以证明它曾是复杂的礼仪中心;五是已有商业;六是虽今尚未出土“大房子”、大墓、冶金技术和文字,但其周边此前和大体同时的聚落已有之(半坡之文字刻划符号、姜寨之铜、彬县水北之“大房子”、灵宝西坡大墓),推知继续发掘杨址很可能有或者部分有这些文明要素。

以上数端,足以确证杨址即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由此看来,安特生以中原仰韶文化为中心探索中国文明之源^[2],直感准确,中国当代考古学绕了一圈还得回到这个出发点。这就是“否定元否定”。

“杨址首源说”目前还面临如何科学而恰当地处理与“河南派”的关系问题。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中原”本来就包括关中、豫西和晋南,且以关中为核心^[2],但在目前陕豫晋分省条件下,作为整体考古文化区的中原往往可能被令人啼笑皆非的“省域意识”所模糊肢解。“河南派”问题的出现,即其一征。苏老曾说“中原古文化”概念“还谈不上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考古学术语”^[2],实际也是在深层学术面上触及了这一问题。目前科学处理的原则,首先应依科学精神在考古思维中完整定义作为整体文化区的“中原”范畴,即应严防其被“省域意识”肢解,也要通过确立杨址首源地位而提升豫西遗址考古学档次。第一,“河南派”主据是灵宝西坡遗址^[14]和密集

于三门峡—洛阳—郑州一线的24处超过40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15]。在杨址未出土前,它们惊艳全国,可以理解。但在杨址出土后,就应在以杨址为核心聚落的“中原”范畴内“互补共赢”地思考陕豫遗址关系。“河南派”有论者在考古学意义上把河南完全等同于“中原”,孤立地突现西坡即“黄帝故都”,郑州西山即“黄帝城”,无视杨址堪为“黄帝故都”而西坡、西山只是“陪都”或“离宫”的可能,似应完善^[11]。第二,从房屋围绕中心布局、陶器形制大体同于关中、时段稍后且规模不及杨址看,西坡、西山等豫西遗址都可能是杨址部族东移发展并吸收龙山文化要素的结果。既然杨址为首源象征地,则西坡、西山等已进入文明社会应无疑。李伯谦教授认为西坡尚非文明社会^[8]以及西坡考古报告说该地“无浓厚的宗教气氛”^[14],未顾杨址,也令人生疑,应可再议。第三,杨址未出土前,豫西诸大型遗址震惊学界,连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主依西坡遗址等设计立项^[16],可以理解。该课题前期主要以豫晋为核心考察范围,后期逐渐扩展,但在杨址出土后,其地位至今未引起应有重视,显然不妥。如果说中华文明源头“关中一元论”确有片面,应被“中华文明多源论”取代,那么“中华文明多源论”后来被推向忽视关中或当时“关中落后论”,就是沿着正确方向多走了一步^[13]。首倡“中华文明多源论”的苏老生前杨址未出土,他说仰韶文化后期豫西先进于关中^[2],虽事出有因,但今天看来就是多走了一步。在此背景上,才有郑州西山遗址群文化“是中原地区最繁荣的仰韶文化”之类的提法^[17],应予完善。

二、红山:辽西女神庙并非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

文明只能伴随着男权社会的诞生而出现,史前女权社会绝非文明时代。辽西女神庙遗址规模是杨址的3倍,坛庙冢台一体,但却表现着典型的女权社会文化,这是它并非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的主因。对此,笔者在《新探西安作为黄帝“铸铜(鼎)地”和“都邑”》一文^[13]中已有细述,包括对女神庙系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之首倡者苏老之见解有所商兑,并根据苏老严肃的治学精神,假设他生前如知杨址,很可能会改其见解。本文则主要商榷苏老学生郭大顺教授在明知杨址时仍重申乃师见解的《追寻五帝》一书。

《追寻五帝》在女神庙遗址并不表现女权社会文化问题上特别费神。郭大顺教授提出,女神庙作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的“主要实证”,是其地有男性大墓,存在“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独尊’的王者身份与地位”^[3]。而仔细捉摸,笔者发现他在论述该址13处积石冢中4处被发掘时,一般避谈其中心大墓墓主人性别,只在论说第五地点之“一岗双冢”东侧圆型冢时,才明确说该墓“墓主人为一年龄为50余岁的男性”并附图片,又说随葬物表明其“当为一掌握神权的巫者和宗教主”^[3]。由此推知,已发掘的其他大墓墓主人可能均系女性,与近旁的女神庙相呼应。当然,这些大墓与中、小墓确实表现出已形成社会阶层分化,但它并不能确证女神庙遗址体现着男权社会文化,更不能证明当地“一人独尊”的王者存在,因为《追寻五帝》作者并未对比该遗址各中心大墓并确定何墓“一人独尊”。因此,所谓“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独尊’的王者身份与地位”就不能确立,只能说当时社会出现阶层分化。其中,第五地点东侧男性墓主人也只是一些中心大墓女主人中的一位“另类”,何况其墓在诸中心大墓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表明其地位并非王者。这一孤例不能改变该遗址总体体现女权社会文化的主基调,更难形成该遗址存在“一人独尊”的男性王者的结论。

女神庙遗址并非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另一重要的证据是,其地“主梁的梁顶”之“最显要的位置”,不是男神庙宇而是女神庙^[3]。其地发掘出的所有神像雕塑,均系女性。在此背景下,郭大顺教授仍坚持此女神庙遗址体现着“祖先崇拜”^[3],确可再议。“祖先”二字中的“祖”字右边的“且”旁,就表征着“祖”之初义为男性^[18];在中国历史文献和传统中,特别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时段的黄帝文化中,所谓“祖先崇拜”只能是崇拜男性先辈^[19],它与男权发展、财产私有初现和儿辈继承密切相关。可见,当时的女神崇拜绝非“祖先崇拜”。

郭大顺教授硬要把女神庙解释为“祖先崇拜”,就应当提出充分论证,包括应当对自己反驳公认的“‘祖先崇拜’起源于父权社会”之论提供充分证据,应充分说明此处作为“先妣”的女神,为何变为“先祖”?处于女权社会向男权社会转型之际,何以此处女神庙不是女权社会文化的表征,反而成为男权社会才出现的“祖先崇拜”的体现?其论断有无其他考古学资料旁证?等等。不圆满回答这些问题,关于女神庙之“祖先崇拜”说就难确立。在笔者看来,郭大顺教授坚持此种明显的错判,原因就在为了

证成女神庙遗址表现着当时先进的男权社会文化,而不是落后的女权社会文化,并进而把它与当时先进的黄帝文化挂钩。令笔者吃惊的是,这种挂钩竟通过硬把女神庙里的女神直接说成黄帝形象的承担者而形成^[3]。众所周知,炎黄是古中国跨入男权社会的第一象征^[13]。在女权社会向男权社会转型之际,其形象无疑应该由男性神祇加以表现;硬把此女神说成黄帝形象的承担者,令人莫名其妙。由此也可推知,郭大顺教授依此坚持或提出的“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3],仰韶文化只能对应于黄帝之前的神农氏^[3],“黄帝族本是在燕山地区土生土长的一个部族”^[3]等命题,也可能均难成立。何况,这些命题基本与古代文献记载不符,故也不合“二重证据法”要求。

上述拙文还对比了杨址与女神庙周边自然生产力及其决定的聚落形态结构状况,指出前者自然生产力甲于全国,后者自然生产力状况均落后于前者^[13]。近有论者也从两地农作物结构大异,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1]。应当说,这才是后者并非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根本原因。笔者发觉郭大顺教授不仅对此种文明出现的“根本原因”毫不考虑,而且反复宣讲中华文明起源于宗教等精神活动的命题^[3]。笔者无法理解,中国文明怎可离开较优越的自然生产力状况而单凭辽西贫瘠深山中的精神活动而诞生?!如此理论指导,难免会有偏差。考古博物学家许进雄先生就依据大量史前考古事实说过,“在中国,国家组织的建立和农业的高度发展,可以说始终是极为密切的关系”^[20]。无视这种极为密切的关系,显然不妥。李伯谦教授还从女神庙文化具有“神权重于王权”特征的角度,说它被“王权重于神权”的中原仰韶文化淘汰势有必然^[16],其实也是对郭大顺教授之“女神文明先进论”的驳议。至于苏老提出所谓晚出的中原文明是在红山文明影响推动下才形成的“次生型”文明^[2],郭大顺教授提出的红山文化曾“向中原进军”^[3]等论断,可能均系误判。可以认为,严文明教授坚持的“中原‘花心’论”至今无误^[21]。

上述拙文还对杨址出土之陶祖体现出的男权文化和女神庙体现的女权文化进行了比照,两者孰先进孰落后一目了然(拙文由于重排注释者之误而对郭教授观点转述有不准确处,特纠正并致歉)。令人欣慰的是,苏老的另一弟子、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教授不仅明确主张女神庙表现着女权社会^[22],而且还倾向于“华山派”^[14]。

三、泰山:浓妆惊艳,珊珊来迟

极负盛名的考古学家李学勤教授说过“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4]。这使人们在“探源”时不能不格外重视以大型城址、城堡众多而著名的龙山文化。李伯谦教授还认为龙山文化已超越“古国”进入“方国”阶段^[8],王震中研究员和何德亮先生也加以呼应^[23-24]。中国文明的这个源头,一登场就浓妆惊艳,使人对之刮目相看。

不过,李伯谦教授明确界定龙山文化总体“在仰韶文化之后”^[8],学界呼应^[25]。还有学者指出,早在数十年前,龙山文化源自仰韶文化即被确认^[26],应当可信。这就意味着,她虽浓妆惊艳,毕竟珊珊来迟,故非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

作为中华文明两大源头,华山与泰山之间夹着河南。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27]及中国东西两种文化交融于河南之说是正确的。问题是,贬低关中文明地位的郭大顺教授又以鼎豆等西传为例,一反傅斯年先生“东胜西之事少,西胜东之事多”的论断^[27],提出了“东胜西”的论断^[3],包括说仰韶文化后期“东胜西”使豫西发展程度优于关中^[3]。此论断的潜台词是当时关中落后,也系误判^[13]。应当说,当时豫西是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杨址首先向东辐射文明的接受地,此时豫西灵宝西坡、郑州西山等文明可能局部先进于杨址;因为稍后强势崛起的“泰山”和“一水”又向西、向北辐射文明,豫西又接受了来自东方、南方的文明成果。这种“东西互胜”中的“西胜东”,后来还演变为“华山”之子周公首开仁道,“泰山”之子孔孟续谱新章,终于铸就中华文明儒学脊梁。

徐良高先生说“红山文化的女神雕塑在后来各文化中均不见”^[10],的确引人深思。从近年史前岩画研究成果看,被李伯谦教授称为“玉文化圈”的“红山”、“泰山”和良渚等^[16],其文化代表之一的岩画后来以红山地区为汇集点,通过白令海峡传播到了南北美洲^[28],可能是南北美洲印地安文明的基因;而非“玉文化圈”的“华山”^[16]之关中,迄无岩画留存,却通过周秦汉唐奠定中华文明骨架。远古发生的史实很可能是,非玉的仰韶文化在政治上最终战胜了“玉文化圈”并大大挤压了后者的发展空间,迫其远遁美洲。历史已经对傅斯年先生“西胜东”的论断有所肯定。

四、结 语

总而言之,从中国聚落考古“三山”文化初步比较研究情况看,龙山虽曾“浓妆惊艳”,但在呈现时间上稍后于华山;红山则在社会发展阶次上落后于华山,二者均不足以对杨址作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构成挑战。显然,只有杨址堪作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

参考文献:

- [1] 杨雪梅.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最新研究成果[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7-13(12).
- [2]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郭大顺. 追寻五帝[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
- [4] 李学勤.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
- [5]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6] 石兴邦. “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C]//胡义成. 黄帝铸鼎郊雍考辩与赋象: 西安古都史新探.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1: 105-111.
- [7] 张天恩. 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状况观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第1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88-93.
- [8] 李伯谦. 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第1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81-87.
- [9] 张天恩. 荆山铸鼎地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黄帝文化[C]//胡义成. 黄帝铸鼎郊雍考辩与赋象: 西安古都史新探.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1: 123-131.
- [10] 徐良高. 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11] 胡义成. 西安是“黄帝故都”吗[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8-13(5A04).
- [12] 王炜林.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报告[C]//胡义成. 黄帝铸鼎郊雍考辩与赋象: 西安古都史新探.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1: 12-19.
- [13] 胡义成. 新探西安作为黄帝“铸铜(鼎)地”和“都邑”: 兼论西安古都史达5000年[C]//胡义成. 黄帝铸鼎郊雍考辩与赋象: 西安古都史新探.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1: 190-234.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灵宝西坡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15] 许顺湛. 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

- 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第1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82-198.
- [16] 李伯谦. 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 [17] 索全星. 郑州西山古城及其周边同时期遗址的考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第1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72-188.
- [18] 郭沫若. 释祖妣[C]//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第1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46-59.
- [19] 何炳武. 黄帝祭祀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 [20] 许进雄. 中国古代社会: 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1] 严文明.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J]. 文物, 1987(3): 33-45.
- [22] 郭大顺. 红山文化[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23] 王震中. 从中原地区国家形态的演进看文明化进程[C]//江昌林.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88-94.
- [24] 何德亮. 大汶口: 龙山文化聚落形态的考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第1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91-209.
- [25] 李玉洁. 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C]//江昌林.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109-138.
- [26] 石兴邦. 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J]. 考古, 1959(10): 13-18.
- [27] 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C]//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北京: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5: 111-123.
- [28] 宋耀良. 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Yangguanzhai village relics in Xi'an, the first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Chinese settlements at “three Mountains and one Lake”

HU Yi-cheng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710065, Shaanxi,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sis of multi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Mountains (Hua mountain, Long mountain and Hong mountain) are all supposed to be the first sour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angshao (Hua mountain) civilization, Yangguanzhai village relics, which is about 6 000 ~ 5 000 years ago and has not been unearthed completely, is proved to be the first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unearthed Tao Zhu etc. Niuhe ridge relics (Hong mountain) at Liaoxi, which is of the same age as Yangguanzhai village relics, is of feminism and falls behind Yangguanzhai village relics. “Solid evidence and dictatorial authority” proposed by professor GU Da-shun is not reasonable. Although Long mountain civilization is gorgeous, its age is not as long as the other two. So it is hard to suppose that Long mountain civilization is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ree mountains, Yangguanzhai village relics is more likely to be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i'an; Yangguanzhai village relics; Niuhe ridge relics; Long mountain civilization